

『女中豪杰』史良

□ 易雨 顾萍 崔倩倩

史良，江苏常州人，从1935年起就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和妇女运动，以救国会“七君子”中唯一的女青年而扬名于世。

惊醒梦中人

1900年，史良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之家。她的父亲是一名私塾老师，母亲是一位知书达理的家庭主妇。7岁那年，母亲把她许配给了一个刘姓人家。长大后的史良知道这件事后，以绝食作为反抗手段，迫使母亲从对方家里把庚帖要回。

五四运动爆发后，常州学联也开始罢课。史良原是常州武进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会会长，这时还担任着全县学联的副会长。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只要有人给她担保，邓中夏就有机会脱身。于是邓中夏托巡捕房的人交给史良一封亲笔信。此前，史良曾经为化名施义的邓中夏给狱中的李璜传递过信件。

史良了解到邓中夏和林素琴已被解送江苏高等法院第三分院（设在租界）受审，她立刻赶到三分院律师休息室，找到法租界巡捕房律师顾守熙，对顾守熙说施义是冤枉的。经过史良等人的大力营救，法院判决邓中夏52天徒刑，同时可以交保释放。史良认为取得了初步胜利。但她万万没有料到，林素琴却很快叛变了，她交代了施义的真实姓名为邓中夏，并指出之前被捕的李璜就是邓中夏的妻子。1933年9月，邓中夏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

（钱钧，出生于1905年，河南光山人。中身份为武汉翻砂厂工人纠察队小组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90年逝世。）

那是一个漆黑而又寒冷的夜晚，我由厂里一位老师傅带领，在大悟县一间瓦屋里见到了董老。当时，董必武同志40岁刚出头，他脚穿浅口布鞋，身穿灰色长衫，套了一件黑布马褂，头戴一顶瓜皮小帽，脖子上围着一条颜色很深的围巾，最突出的是他嘴上那两撇胡子修剪得整整齐齐，看上去活像个教书先生。他面色憔悴，但一双眼睛却明亮有神，给人的感觉是可敬可亲，在他面前，我一点也不拘束。进屋时，我先喊了一声董先生，然后又行了个90度的鞠躬礼。他让我坐下以后，便开门见山地说：“你叫钱永兵（我当时的名字）？”他接着说，“你才这么点年纪，就会那么多手艺，作画、烧炭、倒锅、当漆匠，还会打拳，为什么混不上一顿饱饭吃啊？”我真没想到他对我这样熟悉，更没想到初次见面，他就提到我的吃饭问题，我一时不知从哪儿谈起。董先生不等我答话，又说：“你家三代人都是地主岳六平家的长工，可是就在大年三十那天，他把你们全家人都赶了出来，过不上年，吃不上饭，这是为什么？”

“没有地种。”

“你不能把他家的土地拿过来吗？”

“他是光山县最大的地主，势力大，拿不动。”

“岳六平罪大恶极，伤人害命，你还不把他镇压了，镇压了他，不就拿过来了吗？”

“灭了他还行，灭了以后怎么办？”

“革命呗，怎么办。”

说实在的，当时，对“革命”两

的父亲捆绑到县衙门。县知事声色俱厉地威胁史父，说他的女儿是带头闹事的。这事被同学们发现了，于是史良和同学们一起涌入县衙门质问县政知事。史良说：“我们学生为学校停办的事来找你，你半夜三更把我父亲抓来干什么？”县知事诡辩：“不是抓来，而是请来谈谈。”县知事终于理屈词穷，收回了停办学校的命令，这场斗争就此取得胜利。这件事鼓舞了史良，让她明白了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

那时中国大地上，“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史良被这个伟大的时代浪潮深深吸引。她如饥似渴地阅读当时流行的《新青年》等进步书刊。1923年，史良考入上海政法大学，最初学习政治，后来转学法律。这个选择决定了她一生的道路。1927年史良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一个行政单位做事。那个单位的负责人姓刘，是一个国民党的官僚兼党棍，史良当面顶撞了他，竟因此被关进了监狱。

在狱中，她亲眼看到一些共产党员虽受酷刑却坚贞不屈，赴刑场时仍引吭高歌、视死如归，她深受感动，写下了一首诗。大意是，一个正直的人是有高尚情操的，宁可冤屈而死，也不会在任何情况下同恶势力妥协。在蔡元培的保释下，史良在被关押了两个多月后，终于出狱。然而，狱中的折磨让她看清了国民党统治的黑暗与丑恶，这对她以后的政治活动有着重大影响，史良称自己“从天真的迷雾中惊醒了”。

侠义女君子

1931年起，史良开始当律师。她尽其所能地为受苦受难的人申诉冤屈，伸张正义。一些穷人请她当律师，她分文不收，甚至倒贴杂费和当事人住旅馆的钱。她觉得替贫困的当事人争得权益，比什么都快活。

邓中夏案件对史良影响很大，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史良加入爱国救亡运动行列中，从一名富有正义感的律师逐步成长为关心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政治活动家。

1936年5月，宋庆龄等人响应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号召，在上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史良也参与其中。但她却因此遭遇牢狱之灾，与她同时被捕的还有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这就是著名的救国会“七君子”。史良是这七人中唯一的女性，被其他六人称为“难妹”。闻一多称赞她思想敏锐、有口才，有反对黑暗势力压迫的精神。

1937年7月5日，宋庆龄等人从上海至苏州高等法院，自请入狱，这让国民党当局始终不敢答应。宋庆龄提出探望“七君子”，她首先来到史良被单独关押的房間。她对史良说：“你们的斗争不是孤立的，我们全国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都在支持你们，你们的斗争一定能够胜利。”史良和宋庆龄热烈拥抱，泪水夺眶而出。

史良在狱中并没有闲着，一方面，她把敌人的法庭当讲坛，用法律作武器，宣传抗日救国的大道理；另一方面，她成了女犯人的义务律师，帮助她们研究案情，告诉她们辩护、维权、申诉的方法。

史良在狱中被关了7个月。出狱后她继续发动妇女参加抗战，争取妇女的平等合法权利，是大后方妇女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香自苦寒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史良成为首任司法部副部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事业的开拓者之一。《婚姻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法律，它在保障妇女权益、婚姻自由方面，作了非常大的革新，废除了重婚、纳妾等封建主义的婚姻制度，群众十分拥护，而史良是这部法律的起草者之一。

史良前后担任了两任司法部部长。对于担任部长，史良曾经心里发怵，毛泽东、周恩来鼓励她说：“你不要怕。没有关系，你做好了，有党的支持。”毛泽东还称史良为“女中豪杰”。

1979年，史良当选为民盟中央主席。1985年9月，史良因病逝世，没有给亲属留下遗产。史良生前作为律师，在上海曾承办“地皮大王”周纯卿遗产案，经过一年多时间的查考，将周纯卿生前的财产理得一清二楚，并按此分割给周妻及其儿女。为此，周纯卿的妻子、儿女送给她上海南京西路一幢三层房屋，另外又划给她七浦路里弄十余幢房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她把上述房屋全部捐献给了国家，其大公无私的情怀令人敬佩。

她留给世人的是丰富的精神财富。正是她的侠肝义胆、勤勉务实、大公无私、清廉作风赢得了人们的赞誉，留下了口口相传的美名。

（摘自2018年3月9日《中国纪检监察报》）

董必武同志培养我入党

□ 钱钧

在回来的路上，我心里像是点亮了一盏灯，浑身是劲，原来董先生就是共产党员，他懂的事情那么多，我有了这样的老师，今后革命就不用愁了。

随着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党的威望越来越高。当时，“拜列宁”，在光山县殷区很大一部分人的心目中，已成为最高的荣誉。因为入党，要在列宁像前宣誓，所以，大家都知道，拜了列宁就是党员了，那时，我们管这叫“拜列宁”。我当时天天想着“拜列宁”，就是没人来找我。

1926年，春节刚过，董必武同志又来到了我的家乡，因我同他见面的次数多了，人也熟了，他什么事情都叫我去做，送信，找人，下通知，有时连他吃的点心也是我去买。不管公事私事，我都尽心尽力地为他办好。因为他日夜不停地忙，太辛苦了。有一天晚饭后，他要转移到另一个村去，我护送他，当我们从大路拐进小路时，他拉我在田埂上坐了下来，说休息一会儿再走。董先生坐下以后，顺手捡起一根树枝，用另一只手把地上的土抹平，在上面画了一个圈，圈的当中画了一些人，然后，他拍拍手上的土，用那根树枝指着一圈人问我：“你说，这一圈人打中间这个人，打得过吗？”我说：“打得过。”他又指着圈当中那个人问我：“这一个

人打周围这一圈人，打得过吗？”我说：“打不过。”接着，他又分别拿一根树枝和一把树枝要我把它折断。一把树枝当然是折不断的。他笑了，问我这是什么意思，我说：“要团结，团结起来力量大。”他听了，很高兴，说：“对，革命就要团结。”我笑了，我感到董先生真会开导人，说得我心里亮堂堂的……两个人说着说着，不觉天已黑下来，我担心他的安全，催他快点赶路，他点点头，说：“好，走吧。”

过了几天，我们厂里工人纠察队出了事，情况很紧急，我必须马上找董必武同志请示，还是那位老师傅告诉了我董先生的住址。见了董先生以后，不等他开口，我便一口气说完了发生的事情和我自己的想法：“陈独秀下令，要工人纠察队把所有的武器都交出去，我是纠察队的小组长，发了一支匣子枪，现在硬逼着我把这支枪交出去，枪是穷人的命根子，怎么能交呢？要命有一条，交枪我不干。”董先生听完了我的想法以后，指示说：“你的想法很好，不交枪是对的，但是你不能再在厂里干下去了，必须在五天之内，离开那个地方。”我答应了他。他担心地问我：“你用什么办法把枪拿出来？”这事我早有准备，我把带枪的办法报告了董先生，他表示同意，并一再叮嘱我要提高警惕。

有一分精力，就要为党多做一点工作

□ 张嘉升

1927年罗荣桓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便义无反顾地为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人民解放奉献出自己的全部。1950年，罗玉英曾问过父亲，什么是为人民服务？罗荣桓回答：“就是为人民做事情。吃人民的，不为人民做事情怎么行？”罗荣桓将“有一分精力，就要为党多做一点工作”作为自己坚定不移的信念。他一直同病魔作斗争，却也始终担负着繁重的工作，其初心就是为党和人民多做些事情。医生常劝他要注意养生之道，罗荣桓却总是笑着说：“注意养生当然很重要，不过对于革命者来说，养生不是人生的目的，所以不能用清静无为的办法来解决养生问题，应当把养生当作保证工作效能的一个条件。争取长寿，是为了在革命事业上给后代做出更多的成果。”

1961年，医生根据他的病情，建议他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里离开工作，完全休息。罗荣桓哪能闲得住，他仍然一如既往地批阅文件，读书看报，了解国内外动态。他曾打趣说：“我是个不会休息的人，在娱乐方面也没有什么爱好，这是一个缺点，青年人可不要学我。”当他被疾病折磨得坐卧不宁的时候，林月琴给他打开收音机，拿来画报，都解除不了他的痛苦。这时，如果有通信员送文件来了，罗荣桓会立刻喜形于色，高兴地说：“对喽，快拿文件来看吧！”文件拿到手，他马上忘记了病痛，沉浸在工作的快乐之中。

弥留之际，罗荣桓拉着妻子林月琴的手，深情地对她说：“我死以后，分给我的房子不要再住了，搬到一般的房子去，不要特殊。”他还嘱咐孩子们说：“我一生选择了革命的道路，这一步是走对了，你们要记住这一点。我没有遗产留给你们，爸爸就留给你们一句话，坚信共产主义这一伟大真理，永远干革命。”

（摘自2020年第4期《党史纵览》，原标题为《罗荣桓元帅的家风故事》）



吕俊生的三个“绰号”

□ 谭备战

吕俊生是河北邢台前青峪人，1937年12月参加八路军，1938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他忠心赤胆，勇猛善战，曾荣立8次一等战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被评为全国战斗英雄，中共中央军委曾出版《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纪念刊》，列出了全国350位战斗英雄，其中华北军区排名第一位的就是吕俊生。

在其戎马生涯中，战友们曾亲切地给吕俊生起过很多“绰号”，其中著名的有3个。

第一个绰号是“军中吕布”。吕俊生身高1米92，力大无穷，在白刃战中尤其占优势。且由于他有过人的臂展，投弹时手榴弹扔得极远，让其他战士们望尘莫及。1938年7月，吕俊生所在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东进纵队二团四连在山东夏津县与日军发生了遭

遇战。吕俊生和战友们英勇作战，眼见子弹打光，敌人逼近阵地。危急时刻，连长率领战士们冲出战壕，和冲上来的敌人展开白刃战。吕俊生带头冲进敌军队伍中，左突右刺，不一时，好几个敌人倒在他的刺刀下。全连战士精神大振，终于将敌人打得狼狽逃窜。事后统计，吕俊生在此次战斗中共刺死27个敌人。如此光辉战绩使得他被上级授予一等战斗功臣称号。不久，在一次伏击战中，吕俊生又一口气消灭了17个敌人，再次荣立一等功。由于吕俊生和三国演义里的猛将吕布同姓，战友们就开始用“军中吕布”的绰号称呼他。

此外，吕俊生还曾率领全连多次夜袭日伪，均取得了胜利。由于他在夜袭战斗中枪法极准，战友们就又给他起了“猫头鹰”的绰号。

（摘自2020年8月20日《人民政协报》）

来贴在墙上，把党旗挂在列宁像的上面，党旗上有镰刀、斧头和犁，看到这庄重的场面，我心里“扑腾扑腾”直跳，我知道这不是一般的时刻，也不是一般的事情，而是我一生中的转折点，是关系到我今后做什么人、走什么路的大事情。

董必武同志首先给我讲解了党章的内容，并反复向我说明了党员的义务和权利，然后，他站在列宁像和党旗的左边，要我成“立正”姿势面向列宁像和党旗站好。董必武同志举起了右手，我也举起了右手，这时，我似乎感到在这小屋里站着的不止是我和他两个人，还有很多很多人也举起了右手，站在董必武同志的周围，和我一起跟着董必武同志宣誓：“牺牲个人，服从组织，严守秘密，永不叛党。”

董必武同志放下右手，来到我跟前，握住我的手，说：“祝贺你，钱永兵同志，从现在起，你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了，今后不管干什么事，遇到什么情况，都要以一个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在这一瞬间，无数的往事，都涌上了我的心头，我流着眼泪，紧紧地握住他的手，激动得什么也说不出来。是董必武同志把我这个放牛娃领上了革命的路，是董老领我宣誓入了党，这是我终生难忘的记忆。

（摘自2020年6月29日《解放军报》）

